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 ——史实与评价

郑食赞 程麟荪 张传洪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武 曦

封面设计 邹越非

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

(1932~1949)

——史实与评价

郑友揆 程麟荪 张传洪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10 千

1991年 5 月第 1 版 1991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80515-623-9/K·81

定价: 5.20 元

序 言

在中国近代经济、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史上，资源委员会的发展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资委会 1932 年 11 月成立时仅有 31 名职员，但 16 年后，它已成了一个拥有数百家大中型企业、近 30 万员工的庞大机构。中国近代石油、金属矿开采和冶炼、钢铁、电力、煤、机械等行业中绝大部分的企业都在它的掌握之中。这种速度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资委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其成员几乎全都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的起义，为人民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产。

显而易见，科学地总结资委会的发展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首先，资委会所属企业是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组成部分，不搞清楚资委会发生、发展的过程；不搞清楚资委会的经营方针、方法及其所属企业的活动状况，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工业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也不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以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或近代经济史著作，正存在着这一缺陷。

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营工业绝大部分是在接收资委会所属企业的基础上建立的，原在资委会内工作的数十万员工，成了当时国营工业企业的主要技术骨干。资委会的计划原则、经营方针、企业管理方法，通过这些人对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而，科学地总结资委会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解放以来工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又为当前四个现代化

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最后，在1945年后台湾地区经济建设过程中，原在资委会在台企业工作的许多人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不少人在台湾的政府机构中担负了重要的职务。近年来，台湾的一些学者也开始重视对资委会发展史的研究。因而实事求是地总结资委会的发展史，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祖国统一大业也会有所裨益。

遗憾的是，因极左思潮的影响，长期来学术界对资委会发展史的研究是极为少见的，而在已有的论及资委会历史的论著中，存在着不少错误与偏见。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

在开始论述资委会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一、资委会是不是官僚资本？

解放以来，几乎所有论及资委会的中国近代史或近代经济史论著，都将这一机构视作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工业典型。久而久之，这种说法几乎已成定论。

但是，这种说法是很不科学的。首先，“官僚资本”一词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其含义是非常模糊的。据知，“官僚资本”一词最早见于瞿秋白同志1923年所写的《论中国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①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将洋务运动时期一些大官僚经营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处于统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把持的，“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那时，这一名词并未为学术界接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一词才开

① 该文原载《前锋》杂志1923年第1期，转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8月版）。

始盛行起来，当时泛指国民党政府中一些大官僚利用职权搜括民财，垄断工商业。重庆《新华日报》与其他进步或中间的报刊都这样用了。1947年，毛泽东同志将四大家族垄断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结合在一起的垄断资本称作“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说：“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① 1949年，许涤新同志发表《官僚资本论》一书，将官僚资本划分为七种类型，即官僚军阀本身的资本（也是固有意义的官僚资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国家资本（其中包括资委会所属中国石油公司）、与国家资本结合、与民间资本结合、与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及地方官僚资本。^② 这样，凡是有官僚投资的企业，甚至连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张謇都被划入“官僚资本”行列。

然而，作为一个“通俗名称”，官僚资本一词虽然简单易懂，并已为广大群众接受，但实际含义仍是模糊的，用它概括资委会的性质恐有不当的。原因之一是，将资委会称作官僚资本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解放以来，官僚资本被认为是“最黑暗、最野蛮、最无耻的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它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没有任何独立性，它的活动“恶化整个国民经济”。^③ 人们一提到官僚资本，就会油然地与反动、落后的事物联系起来。而根据我们的研究，资委会的事业在旧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资委会是一种反动、落后的事物，缺乏历史事实，言之为国家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则更确切些。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9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② 许涤新：《官僚资本论》，第51～52页，海燕书店1949年版。

③ 吴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5期。这篇文章可以代表以往学术界对官僚资本的普遍看法。

二、资委会是不是中国经济史上的畸形产物？

资委会在短短的十多年间，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这种发展是依靠国家的权利力量取得的，它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发展方式。因而，不少人将资委会的发展视作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产物。

一般说来，国家资本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这一矛盾日益尖锐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即对一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国有化”。^①无疑，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未达到这种程度。因此，初看起来，资委会经营的国营企业迅速增长的情况是不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然而，问题在于：在当时情况下，中国能否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循着私人资本自由竞争的道路来发展近代工业。首先，当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而中国资本主义起步晚，基础弱，即使在国内市场上也无力与外国在华资本和进口商品竞争，更不可能通过向世界市场倾销商品来为本国工业提供扩展的机会。其次，中国国贫民穷，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储蓄率则更低，发展近代工业需要巨额资金，尤其是交通、电力和各种重工业所需资金，私人资本一般无力承担，而这些部门不发展，其他工业部门也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而难以迅速发展。第三，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日本的军事侵略时时威胁着中国的存亡，只有迅速发展经济才能摆脱灭顶之灾。正如列宁所说：“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②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恩选集》第3卷，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既然，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不可能步欧美资本主义的后尘，那只能另行选择通过建设国营企业加速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办法了。通过国家的手段筹集更多资金，建设一些大型企业，从而增强与外国资本竞争的力量。国家也可从长远的经济目标出发，将大量资金投入一些暂时不能获利的社会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部门，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资源委员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此，它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畸形产物，恰恰是适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之需。但也毋庸讳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挑起全面内战，将国民经济推上了崩溃的境地，也断送了资委会数十万员工通过“发达国家资本”促进中国富强的美好愿望。

撰写本书的准备工作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始。当时，在黄逸峰同志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人员摘抄了大量资委会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年参加这一工作的有解树民、徐元基、顾则先、张传洪、黄汉民、刘鑫龙、方德媛、唐友珍等同志。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前后访问了原资源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包括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恽震、季树农、曹立瀛、吴福元、周大训、苏曾诒、黄肇兴、陈中熙、谢佩和、吴铎、吕浦等数十位同志以及吴兆洪先生的遗孀周克柔女士。他们都热情地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本书初稿完成后，沈祖棻同志曾审阅了一遍，恽震、季树农等同志审阅了部分章节，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此，我们谨向上述各位同志以及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热情帮助过我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重庆、天津、上海等地档案馆的同志致以深切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是难以完成的。

本书在郑友揆领导下开展工作。第12~14章由郑本人执笔，第1、2、4、5、8、9、10、11章由程麟荪执笔，第3、6、7章及大事记由张传洪执笔。

本书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资源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初期的活动	1
第一节 资源委员会在全国抗日高潮中组建	1
第二节 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1932~1935)的活动	10
第三节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改组与调查研究工作的 深入	18
第二章 抗日战争前的重工业建设计划	22
第一节 业务重点的变化及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	22
第二节 “计划”实施的困难与资源委员会的应付方案	27
第三节 “计划”的推行与夭折	33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的扩展及冶金、机电等 行业的发展	42
第一节 购置军用物资及组织工矿内迁	42
第二节 资源委员会的改组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发展 过程	47
第三节 钢铁工业战时生产状况	52
第四节 电工器材业战时生产状况	56
第五节 机械制造业战时生产状况	63
第六节 金属矿业战时生产状况	68
第四章 抗日战争期间资源委员会的动力事业	71
第一节 战前后方动力事业的落后状况与战时 需求的增长	71

第二节	煤业的改革与发展	74
第三节	电业经营状况与水力资源勘察	81
第四节	玉门油矿的开发	89
第五节	动力酒精及其他汽油代用品的生产	98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企业活动总论	107
第一节	发展速度及其在后方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107
第二节	资源委员会战时企业活动的特点	115
第三节	资源委员会战时企业活动的意义	124
第六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后方工矿企业的调整与沦陷区	
	日伪企业的接收	130
第一节	后方工矿企业的调整	130
第二节	接收沦陷区企业的设想与方针	133
第三节	关内地区日伪企业的接收	138
第四节	东北地区日伪企业的接收	143
第五节	接收企业资产总值估计	154
第七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建设规划与初期的生产恢复	
	状况	158
第一节	战后组织机构的大改组	158
第二节	战后建设规划的原则及目标	166
第三节	华北地区接收企业的初步恢复	169
第四节	东北地区接收企业的短暂复苏	173
第五节	华中与华南地区原有企业的扩充与新企业的 创设	178
第六节	战后初期各业生产进展状况	184
第八章	战后对外经济关系与在大陆事业的失败	189
第一节	争取外援与日本赔偿物资	189
第二节	战后建设计划的破产	197
第三节	1948年的生产实况与战后建设计划的比较	202

第四节	战后在大陆各地区事业失败的原因	206
第九章	1945~1949年台湾工矿业恢复和发展	212
第一节	台湾地区的日伪工矿企业接收与资源委员会 经营方针	212
第二节	糖业的复产	217
第三节	电力和其他各业的恢复	225
第四节	1946~1949年资源委员会在台事业总论	236
第十章	对钨锡铜等特矿事业的统制	245
第一节	统制前特矿业概况与资源委员会统制机构的 建立	245
第二节	统制后特矿业生产状况	255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统制方法的变化及其结果	264
第四节	改善矿产品质量与改进生产方法的努力	267
第十一章	特矿统制后产销量的变化与易货偿债协定	271
第一节	历年产销量和销售国别的变化	271
第二节	特矿产品的利润及其分配	277
第三节	易货偿债协定的内容及性质	283
第四节	特矿统制活动的意义	291
第十二章	人事制度概述	302
第一节	崇尚孙中山遗教 重视知识与人才	302
第二节	广泛招收各种专门人才	304
第三节	创造既有保障又有竞争的环境	307
第四节	抵制国民党党部势力的渗透	313
第十三章	财务制度析要	316
第一节	经费来源	316
第二节	各类事业经费分析	318
第三节	通货恶性膨胀与资源委员会的盈利	321
第四节	外汇收支状况	324

第五节 财会制度的独立性	327
第十四章 资源委员会在大陆弃暗投明迎解放	329
第一节 起义的酝酿	329
第二节 南京五厂拒迁	332
第三节 在上海坚持斗争迎解放	335
第四节 陈毅同志对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勉励与期望	337
第五节 其他地区资源委员会所属单位的起义斗争	341
第六节 资源委员会起义的意义	346
资源委员会大事记	351

第一章 资源委员会的设立 及其初期的活动

第一节 资源委员会在全国抗日高潮中组建

二十年代末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源于美国，很快就席卷全球，严重地打击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一面强化国内统治，一面准备进行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由于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国内市场极为狭小，因而，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物价暴跌对日本国民经济的打击也格外沉重，导致大量工厂倒闭，生产急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恶化，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日本国内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乘机活跃起来，大肆鼓吹发动侵华战争，将其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政府的纵容与支持下，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国民经济也迅速走上了扩军备战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日本终于成了东方的战争策源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阀悍然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短短四个月间，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3,000万人民、数千公里铁路和无限的宝藏全数沦陷。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举国震动，日军的暴行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全国人民。广大工人、学生以至许多工商业资本家纷纷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请愿，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出兵抗日。在全国抗日怒潮

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内部一部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或亲英、美的人士也群起敦促政府及早准备对日抗战。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倡议人是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① 钱昌照，字乙藜，1900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学毕业后即自费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深受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费边社会主义是英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主张采取温和缓进的办法，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市政机构，逐步把土地和产业资本转归社会所有以实现“社会主义”，反对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钱昌照留学回国后，就想在中国推行费边社会主义。他凭着与前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关系，访问了当时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等人。孙传芳曾要钱昌照担任秘书长，但钱昌照认为孙传芳不是个能成大业的人，借故却而不就。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蒋介石的把兄弟黄郛任外交部长，钱昌照是黄郛的连襟，黄郛委他当外交部的机要室主任，不久又推荐给蒋介石当了国民政府的简任秘书。以后，钱昌照逐步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到两年就担任了教育部常务次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钱昌照就向蒋介石提出了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他认为，九·一八事变表明，日本迟早会大举侵犯中国。中国为避免灭亡，势必起而抵抗。但中国经济落后，国防实力薄弱，若不未雨绸缪，及早准备，一旦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主张要加强国防，首先制订一个较为完备的国防计划，作为国防建设的基楚。于此他提议组织一个

^① 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全国），1961年第15辑。另据资委会最后一任副委员长吴兆洪回忆，这一建议是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首先提出的，但黄郛本人不愿出面，都是公愚其连襟钱昌照向蒋介石提出。见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载《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第65～6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2月版。

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的调查、研究和制订计划的工作。钱昌照还草拟了适宜参加这一机构的人选。当时，国民政府内派系林立。钱昌照为了独树一帜，在拟订名单时，有意物色了一批未在国民政府内任职，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声望的银行家、实业家、学者。钱昌照的建议深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在当时情况下，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对蒋介石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首先，它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其时，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的一统地位尚未稳固。在中央政府里，行政院长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势力仍占上风，在地方上，各省军阀也不愿受南京政府节制，经常打出独立的旗号，与之分庭抗礼。这一切，对于蒋介石的统治都是极大的威胁。面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内，蒋介石的力量主要是军队，政治、经济等其他部门势犹未尽并不很强。因此，他迫切需要拉拢一批知名人士为己所用。在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原来也有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陈布雷拉了一批知识分子为他出谋献策，但这些人在全国并无多大威望，“只能算是三、四流角色”。^①全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当时都云集北方，与国民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尤其对对日妥协的方针极为不满，时常作出尖钱的批评和指责。一些大企业家、大银行家也经常埋怨国民政府对工商实业摧残有余，保护不力。由于这些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的态度对国内外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蒋介石若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无疑会加强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而要网罗这些人其所用，最好的办法则是打出准备抗日的旗帜。

其次，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有助于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英美

① 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载《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第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2月版。

等国对于日本要独霸中国的企图深感不安，它们不愿坐视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被日本轻易地夺去，但同时对于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及对日一味退让妥协的政策也颇为不满。因此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个机构，拉拢一批受英美等国影响，又深得英美等国信赖的分子和私人企业家，从事一些抗日的准备工作，以争取英美等国从政治上、经济上更多地支持中国。

第三，当时的形势也迫使国民政府必须作一些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准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国际调解，收回东北主权。但得志猖狂的日本军阀无视国际法准则，不仅拒不撤兵，反而继续策划伪“满洲国”和步步向华北进逼。国民政府虽然愿意向日本妥协，但毕竟不愿意让日本吞并整个中国。

出于上述种种考虑，蒋介石同意了钱昌照的建议和所提人选，要钱昌照代表蒋介石出面邀请这些人交换意见，再邀请其中部分人与蒋介石会面或为蒋介石讲学，以便蒋介石从中物色合适的人选。此外，蒋介石还提议由陈其美的兄弟陈其采担任这机构的负责人。钱昌照认为，陈其采是一个典型的政客，难以号召知识分子，应该挑选一位知名学者担任负责人，并向蒋介石推荐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十四岁中秀才，清末留学比利时，曾获罗文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受聘至北京地质调查所任教，1922年后长期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并一度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翁文灏学术造诣很深，提出过不少在地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论点。他所领导的地质调查所是当时这一学科中国内最著名的机构，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翁文灏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曾拒绝英商高薪聘请，甘愿到地质研究所等机关从事清苦的研究工作，立志要为中国的科学进步、国家富强出力。因此，他在全

国学术界名声蜚然，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①

蒋介石同意了钱昌照的建议，钱昌照即向在北京的翁文灏以及另外两名北大教授胡适、丁文江发出电报，代表蒋介石邀请他们到南京“共商国计”。但这些教授们对蒋介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经常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撰文表示异议，不愿轻易与蒋介石合作，相继托辞不就。1932年夏，蒋介石又派钱昌照亲自到京、津一带访问这批名流学者，再次邀请他们与蒋介石面谈。于是，翁文灏就随钱昌照上牯岭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翁文灏说：“自从民国以来，当局人物都对国家不起，只顾个人争权位，不知保全国家领土。我过去也是这样的人，从今天起，我愿意改变方针，至于国事应该如何办，要向翁先生请教。”并表示愿以三天时间，听翁文灏面陈治国方略。翁文灏深为感动，侃侃进言：“政府天然有保全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进侵华北，亦必由华北以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起全国责任，因此愈感恐慌。此为目前存亡所关，如果政府肯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样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易于集中推动。”^②翁文灏又根据自己历年调查所得向蒋介石扼要介绍了全国矿产资源分布状况，认为经济建设应以资源状况为基础。最后，他还一再提出告诫：在此外侮迫切，国事紧急时代，应超越党派界限，广为搜罗人才，为国出力。^③对翁文灏的这番话，蒋介石表示极为赞同，又提出了设立国防设

① 翁文灏此后又曾担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但全国解放前夕，他脱离了国民党政府，拒绝追随蒋介石去台湾，也拒绝了美国各界的邀请，毅然由法国转伦敦回抵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毛主席曾认为翁文灏是个有爱国的国民党政府人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 翁文灏：《回顾往事》，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80辑。

③ 翁文灏：《年谱初稿》（手稿）。